

偏見與認同：《瘋狂動物城》的 烏托邦政治隱喻*

陳世華 劉 晶

[提 要] 偏見與認同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瘋狂動物城》將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情結同時融入劇情當中，為偏見與認同的理解和解決提供了更為廣闊和感性的視野。該片既體現了“想像的共同體”的烏托邦認同，隱喻了景觀社會，反映了美國價值觀，又體現了無所不在的反烏托邦的偏見。比如，在影片中刻板印象隱喻種族偏見，羊隱喻弱者的偏見。媒體在維持偏見中扮演重要角色，應該通過溝通消弭偏見。娛樂救亡或將成爲一種趨勢，我們需要更多能夠引發更多思考、爲改造世界創造可能性的文化產品。

[關鍵詞] 偏見 政治隱喻 烏托邦 景觀社會

[中圖分類號] J9; D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1 - 0066 - 09

偏見與認同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幾乎從人類社會誕生之日起，偏見作爲一種人類心理，就普遍存在於社會群體及其成員中，而糾正偏見、增進認同、凝聚共識、整合族群也成爲民族國家的題中之義。美國作爲種族複雜的移民國家，面臨的偏見與認同危機更爲集中，其共同體的建構正在經歷從“民族國家”向“公民國家”轉換，促使族群認同向主權政治共同體認同轉型，“多元一體”和“合衆爲一”也成爲美國社會的未來趨勢，這也體現在美國的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中。廣受好評的《瘋狂動物城》就承載了這樣的文化使命。如何處理好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文化多元與政治一體的關係，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少數族裔的身份地位、權利關係、文化差異和國家認同上。偏見與認同是二元對立的，一直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之間游走，鮮有交集。然而 2016 年迪士尼的動畫影片《瘋狂動物城》卻將二者結合，隱藏在“小鎮少女進城實現夢想”的美國夢經典故事框架之下的，實際上是一個關於種族歧視和族群融合、固有偏見和塑造認同的主題。儘管是一部動畫影片，《瘋狂動物城》卻給偏見與認同的理解和解決提供了更為廣闊和感性的視野。這部影片成功地用極致視覺景觀和政治隱喻對比了成人世界的骯髒和童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政治視覺修辭的表徵與提升策略研究”（項目號：17CXW024）、江西省藝術科學規劃課題“電影政治經濟學研究：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階段性成果。

話世界的美麗景象，讓我們看到“公民國家”的曙光。電影英文名 Zootopia，就來自 Zoo（動物園）與 Utopia（烏托邦）的組合，這部政治寓言般的動畫電影不同於奧威爾《動物莊園》中的反烏托邦主題，而是在結構上巧妙地將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情結同時融入劇情當中，讓我們看到理想與現實的張力，偏見與認同的距離，在情節設計、人物塑造和視覺表現上，更是幾乎完美演繹了當年奧威爾在《我為何寫作》中的願景：“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寫作變成一種藝術”。

一、烏托邦：消費主義下“想像的共同體”

烏托邦原意為“不存在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延伸為不可能完成的美好理想，甚至可以從漢譯的字面上理解為“烏”是沒有，“托”是寄托，“邦”是國家，組合起來就是“空想的國家”。原提出者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十七世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托馬斯·莫爾在其名著《烏托邦》中虛構了一個航海家——拉斐爾·希斯拉德航行到一個奇鄉異國“烏托邦”的旅行見聞。烏托邦是一個理想化的沒有壓迫、沒有階級之分的世外桃源。在那裡，私有制被認為是萬惡之源被徹底消滅，財產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共同勞動、生產和生活，按需分配。

（一）烏托邦：“想像的共同體”的彼此認同

莫爾所構想的烏托邦實際上是“想像的共同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研究民族主義生成時，將民族視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當時新的傳播媒介——印刷傳播引發現代的民族主義意識，進而生成民族國家的知識譜系。某種意義上說，國家認同的形成也是一個媒體塑造現代神話的過程，這種對擁有共同歷史和起源的社群的想像，彌合了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在平等的訴求下認同彼此的價值觀，形成統一的社會群落。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區分了兩種不平等：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以及精神和政治權利不平等。第一種不平等具有一定的接受度，但第二種不平等在文明社會普遍受到批評，並產生了一系列解決方案。認同就是掩蓋和消弭第二種不平等，凝聚社會力量，塑造社會共識的手段。作為一個名詞，認同指的是個人在心理上的歸屬感和依附性，作為一個動詞，認同着眼於公民政治態度上的承認與贊成。《瘋狂動物城》反映的正是利用認同消除不平等，建構“想像的共同體”的烏托邦社會的美好願望。

在動物城中，除了市中心，還有洞穴區、雨林區、撒哈拉沙漠區和凍土區。製作團隊將各個區的特點反應在該區的建築上，例如凍土區有很多俄羅斯式建築。動物城儼然就是一個龐大的地球都市縮影，市中心影射的是信息資本主義情境下的動物版美國，各類型動物已經在“契約精神”和“消費主義”指導下，表面上消除了盧梭所言的第一種不平等即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彼此“認同”：不管是食肉還是食草動物，進入了文明社會，在消費的狂歡中彼此認同，而非原始的弱肉強食，通過動物城中心不同動物的分工合作，共同生產和消費，使盧梭所說的第二種精神上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在形式上得到了改進。動物城中的各種動物都對自己所屬的區域有著準確的認知，這一心理過程讓整個社會更加和諧有序。居民們對動物城表示認同和忠誠，與城邦之間發生情感上的契合，在公共事務中表現出對國家的支持和追隨。在動物失蹤案中，大家在公共領域（市政廳）集體討論對策，由有關部門（警察）全權負責破案，大家積極配合（水牛、兔子、狐狸、水獺等），獻計獻策，共同促進社會的治理，重塑社會秩序，回歸烏托邦式的生活。

（二）“景觀社會”的隱喻

動物城中宏大而精緻的場景象徵了現代“景觀社會”。現代社會是物質高度發達，文化和精神高度繁榮多元的社會，也就是鮑德里亞所說的“消費社會”，我們在不斷消費物質和服

務，也在消費符號和意義，物質、符號和意義的堆砌和整合鑄就了現代豐富多彩的景觀社會。動物城中的景觀設計與現代社會的景觀有著高度的契合，幾乎就是美國城市社會的複製和再現。動物城核心區的場景就類似於美國紐約市中心的時代廣場，廣告牌上的廣告也很有趣，比如有類似耐克廣告語的 Just Zoo It；PREYDA 是對 PRADA（prey 指獵物）的戲仿。動物城居民用的手機商標，是被咬的胡蘿蔔，與蘋果手機的 logo 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如居伊·德波所說的“世界已經被拍攝”，資本主義社會正演變為消費物品的影像堆砌而成的景觀社會，消費社會的景觀反映了人類物化了的世界觀，本質上就是以影像為中介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在動物城中，不同種類的動物都在享受著同樣的技術，同樣的消費盛宴，並以主角朱迪步行的視角來拍攝，這些巨大的、封閉的、包圍式的景觀就像夢幻的宮殿、鏡像大廳、幻覺長廊……這種視覺修辭把購物中心視為伊甸園，景觀社會也就變成了烏托邦欲望的鏡像，反映了墮落的人類社會對原生樂園的懷舊欲望，當然他們也知道這個烏托邦樂園只是一個幻覺，^①只是一種景觀的影像再現。龐大的動物版美國在向鄉下的兔子朱迪宣揚其耍弄技巧、製造神話和仿真的能力，所有動物都迷失在豐裕社會漂浮的能指裡。

（三）美國價值觀隱喻

《瘋狂動物城》故事情節、人物塑造都蘊含著鮮明的美國價值觀色彩，實際上宣揚了一個動物版的“美國夢”。影片中農耕的兔子朱迪是一個懷揣夢想進城努力打拚的鄉下女孩，在警官培訓考試中經過層層選拔成為了一名維護正義的警察。柏拉圖說，若人心簡單，那麼正義也將是一件簡單的事。朱迪懷揣著簡單、直接、有效的美國式價值觀，最終通過努力和機會實現了夢想。鄉下女孩兔子朱迪正是抱著單純美好的正義夢想，不顧善良傳統的父母反對，毅然決然走上了追求夢想的道路並成功如願，屬於典型的美國夢故事。柔弱的羊女士也登上了副市長的寶座，這是達文主義盛行年代所無法想像的，反映的正是通過自身的努力，弱者可以成為強者，底層人民可以成為上層人士，實現階層流動。這是在標榜美國是一個階層自由流動、機會平等、一視同仁的文明社會，告訴廣大觀眾，通過民主政治和個人奮鬥，你就可以收穫夢想。

為了體現美國文化的創新和活力，凸顯戲劇張力和顛覆威權思維，影片中的大人物往往很“小”，小人物往往很“大”。比如黑幫老大 Mr. Big 的做派，以及發生在它女兒婚禮上的情節，是在向經典電影《教父》致敬。影片暗含了這樣的隱喻：若動物擁有了文明和秩序，也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員。例如朱迪兔會因為在浴場看到裸體的動物而害羞；體量大的動物儘管具有先天的優勢，但依然可以對世界上最小的哺乳動物齶齶心悅誠服；夏奇羊這樣的食草動物可以成為超級巨星，讓四隻肉食動物圍著她跳舞……這些正是一個充滿活力和理想的烏托邦社會裡的場景。

秩序和規則是美國自稱的法制社會和文明社會的關鍵要素。影片處處反映了對規則的理解，體現了美國人對現代文明和秩序的尊重。兔子朱迪在偵查中遵守法律，不能無故私闖民宅，因此使詐把錄有狐狸尼克逃稅證據的錄音筆丟到民宅內，誘使狐狸翻牆去撿，從而使得自己有正當理由闖入民宅。即便狡猾如狐狸，也害怕因偷稅漏稅所要負擔的罪行，這也契合了西方諺語“這個世界上只有死亡與交稅是永恆的”，體現了美國人遵守法律和道德的價值觀念。

二、反烏托邦：無處不在的偏見

因為人性的貪婪和奢侈，理想國從未出現過，烏托邦的美好和虛幻對比了現代社會的殘酷和真實。認同的反面就是偏見，認同的迫切需求就源於偏見的無處不在。“任何一個城市事實上都

是兩個城市的綜合體，窮人之城和富人之城，他們相互憎恨、相互對抗；同時，每一個城中城又包含若干個更小的城——你若將他們視為統一的城邦，那你就大錯特錯了。”^②雖然《瘋狂動物城》看似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動物世界，但區與區之間有城牆隔開，不同的動物都有各自規模不同的生存系統，階層固化的隱喻比比皆是，這個諷刺的設置顯然是在暗示現實美國真實存在的問題。

（一）種族隱喻：食肉動物的“原罪”與刻板印象

善和惡作為一種倫理判斷，本身也是一種偏見。善惡的標籤本身是一種主觀認知，不可避免帶有偏見，而永恒的善惡是無法辨識的。“我提醒你，我不認為自然是美麗或醜惡的，是秩序井然的或一片混亂的。只有在我們想像的關係中，事物才能稱為美或醜，井井有條或混亂不堪”。^③偏見或者說歧視，至少是顯性的政治不正確，是行動上的區別對待。人與人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認知和交往不可避免存在刻板印象（stereotype）。刻板印象一直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影響著人們的認知和行為，也得到引起了學者的廣泛探討。刻板印象是認識主體對認知客體的一種簡單化和固定化的認知結構，反映了某一類成員所具有的特徵。這種認知方式具有信息加工的功能，可以減少我們需要獲取和加工信息量，同時也會把一些負面的信息強加到某一類群體的成員身上，而不管這是不是符合實際情況。偏見是認知主體對其他群體的負面情感以及相關的負面認知，而刻板印象作為一種偏見，反映了某一族群對其他族群的負面情感和認知。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偏見和刻板印象的最新趨勢也在影片中得到呈現。相對以往赤裸裸的語言和行為暴力，當前美國的種族偏見就含蓄和隱蔽得多了，越來越重視所謂的“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性），善於克制自己在性別、種族、宗教、殘障等方面表露出任何歧視，比如將黑人稱為“African-American”（非裔美國人），而不能用膚色的“Black”（黑人），更不得用侮辱人格的“Negro”（黑鬼），強調屬地特徵而非生物性特徵。但在友善的表面下，特定族群內心深處對其他族群的偏見是無法抹去的。作為心理傾向，偏見帶有先入為主的主觀好惡判斷；作為思維慣性，它像一道“隱形天花板”，令少數族裔無時無刻不體會到主流族群的傲慢和偏見。

現實中，階級、種族、職業、歷史的刻板印象並沒有隨著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消失，反而更加隱蔽和流行。在動物城裡充滿著各種刻板印象，有市民對貼罰單的朱迪喊：“你們警察都是壞人”，體現對警察知法犯法的刻板印象。影片中角色和職業的隱喻體現了對某一族群的刻板印象，如整齊劃一的銀行職員、孔武有力的警察、效率低下的車管局，嚴肅沉穩的獅市長，表明忠厚背後陰險的羊副市長。在影片的角色設計也可以看到偏見：缺乏主見、行為單調的倉鼠們，穿著風格很像金融或法律從業者；與狐狸尼克一起行騙的小耳廓狐的黑人腔的墨鏡，以及開車時放的嘻哈樂，令人想起混幫派的黑人；朱迪兔的臺詞“兔子可以說兔子可愛，可其他動物不能說”，似乎是影射美國社會的潛規則“只有黑人能稱呼黑人‘nigger’”。

作為當屆警察學校最優秀畢業生，朱迪作為小型食草動物和女性受到了牛局長的歧視，分配任務時讓她去當交警貼單，反映了男權社會下地女性的性別歧視。當朱迪發現竊賊奮力追回被盜物品時，牛局長不僅沒有表揚反而批評她擅離崗位造成街面秩序混亂。“兔子不可能當警察，那是食肉動物幹的事。我們世世代代都在兔窩鎮賣胡蘿蔔，這樣也很幸福。”“我們怎麼可能相信一個狐狸嘴裡說的話？”這樣反映族群偏見的臺詞比比皆是。在影片中，兔子很可能指代從體格到社會地位都相對弱勢的亞裔女性，而狐狸則指代被當地不少白人視作“撒謊成性”墨西哥人。

美國一直自稱是民主國家的典範，法制和秩序是美國引以為榮的優勢，這種自豪感也反映在文化產品中，《瘋狂動物城》也反映了民主和法制。生活在同一個動物城中，要遵循各種基

本規則，體型不同的動物們享有不同尺寸的生活空間。但是，民主和秩序也隨時受到挑戰和威脅，影響社會的規則和運轉。狐狸會利用規則的漏洞去賺錢，城市中仍然存在“毒品販子”和陰險小人。因為偏見，沒人相信兔子朱迪能成爲一名好警察，沒人相信狐狸尼克的真誠，獅市長擔心自己作爲食肉動物無法得到群眾的信任……在這部現代寓言中，可以毫不費力地找到人類社會的映射。

（二）羊的隱喻：弱者的偏見

強者會受到崇敬和模仿，但也容易受到批評和質疑。弱智更容易受到同情和憐憫，也會對強者有偏見和歧視。弱者對其他群體的偏見受人忽視，不易受到質疑，反而流傳更廣，影響深遠。強者有著更多的獨立性，而弱者更容易抱團取暖而一致對外，關係密切有著強烈的群體共識和排外傾向。弗洛伊德就認爲密切的群體是通過使一切敵對情緒或消極情緒外化而得到維持的，群體內部的約束感越強烈，就可能找更多的局外人作替罪羊。^④動物城中的弱者就是利用對強者的偏見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維護群體利益。

在動物城中，令人驚訝的是最大反派竟然是最柔弱的食草動物“羊”，這也是試圖證明權力可以腐化人，甚至是無比廉潔的人。莫爾在《烏托邦》中用“羊吃人”的比喻來形象地反映弱者的偏見：“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麼馴服，吃一點點就滿足，現在據說變得很貪婪、很蠻橫，甚至要把人吃掉……”^⑤整部動畫片裡，最大的陰謀家是看上去最無辜的綿羊副市長。而她實現野心的武器，根本不費彈丸，只是兩個字——分裂，階層分裂、族群分裂，而分裂的第一步，就是不同動物之間的心理疏離、互不信任。爲何分裂能達到羊副市長的目的？奧威爾在《1984》裡一語中的：“分裂就是統一”。影片設定中，動物城本身是一個高度斑斕但又和諧共處的文明社會。有雨林區、沙漠區、冰川區和中心區，但不妨礙各種動物自由穿行、生機無限，所謂“和而不同”。但“和而不同”無法帶來羊副市長想要的權利壟斷，分裂與恐懼才能將食肉動物邊緣化。弱者利用大家的同情心，維護自己的一己私利，反映了社會對弱者的偏袒和縱容，給社會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社會方向在偏離。

影片裡還可以看到無處不在的羊群效應。弱者往往會形成聯盟，就猶如羊群的從衆效應。影片裡一共出現了警察局、銀行、車管所三個機構。而在這些機構裡，很容易就出現羊群效應。影片中從銀行裡排著隊走出來，又排著隊吃“瓜子冰棍”的一群倉鼠就是一幕生動的“羊群效應”，反映了金融行業和律師行業的從業人員的盲從和依附。由於真實存在和想像的壓力，個體爲了回避風險獲得安全感而被迫或者主動服從於群體，使自身的言行和集體保持一致。在這些官僚機構裡，這更可能發生。比如，在動物城的警察局，警察們基本都是一群威猛、寡言的食肉動物；而吃貨胖胖豹，只能在前臺，甚至後來，連前臺都保不住。就是因爲機構從天然意義上就是穩定而趨同的，像一部高速運轉的機器，人只是其中的螺絲釘。機構有著“流水線”的性質，在“流水線”上，個性不太有存在土壤。趨同在某種意義上就意味著效率。直到兔子朱迪的到來，像一隻鮎魚，把整個警察局的“水”改變了攪渾了。這也反映了製作者對羊群效應的盲目從衆的批評，以及希望有人能夠打破這種從衆，獨立思考和行動，給社會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

（三）平等和自由的衝突

平等和自由作爲西方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本來存在一定程度的衝突和不兼容性。權力的平等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不平等中找平等只能是自取其辱”。而民主制仍然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所有人都享有同等選擇權的時候，在經過訓練和合適的人中選出能力最

佳的人，並使其他人心悅誠服。但就像杜威聲稱的那樣：物種不變，階級便不會變；物種轉化理論出現時，各階級之間才會相互流動。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早就闡述了二者的衝突，把平等視為對自由的威脅。杜威、哈耶克、德沃金在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平等和自由是衝突的，有時衝突不可調和，並試圖從資源、權利、幸福感等方面去平衡自由和平等的衝突。

在動物城中，平等和自由的衝突也是隨處可見。食草動物羊為了獲得食肉動物一樣的平等地位，不惜利用食草動物對食肉動物的偏見，挑起雙方的戰爭，試圖將對方驅逐出動物城，這正是約束和剝奪自身群體之外的其他群體的自由。兔子朱迪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食肉者的本性可能不會改變，被羊副市長借此發揮把食肉動物都排除到政治之外，甚至讓其處於被壓迫者的地位。“至於人民，他們沒有絲毫的想法，只會重複統治者樂於告訴他們的那點東西。”^⑥影片結局是逮捕了有罪責的羊副市長，卻沒有株連到其他食草動物，各族類重返理想的烏托邦動物城，體現了對於法律的尊重：誰犯罪就依法懲治，也反映了實現自由和平等同時共存的可能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強者（食肉動物），還是弱者（食草動物），誰觸犯法律，都要接受相應的懲罰，這種平等也保障了食草動物和食肉動物的自由，讓動物們的生活重新恢復正常，反映自由而又有秩序的理想。影片最後，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消除隔閡開啓公民狂歡模式，在全民偶像夏奇羊帶領下唱起了《Try everything》，暗示“沒有什麼不可能”的美國精神。正是這種美國精神促使族群之間消除偏見，促進認同，實現融合。國家認同是現代民族國家體系與歷史上的認同進行妥協的產物，既有其歷史文化基礎，又是現代政治構建的過程。

三、娛樂消弭偏見，溝通增進認同

在偏見彌漫的社會中，能否找到普遍的認同？在反烏托邦的現實中，是否還能實現烏托邦的理想。媒體又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問題的答案就在於溝通。

（一）媒體維持偏見

在現代媒介化的社會中，媒介成為反映現實，監測環境，提供信息和娛樂，維持社會關係的工具。但是媒體是否客觀地反映了社會現實呢？動物城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在新聞專業主義盛行的美國媒體行業，客觀公正平衡的專業主義理想只是一個幻象。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策劃和製造媒介事件來設置議程、左右輿論，重塑人們對周圍環境的認知。動物城的主題也在隱喻媒介“假事件”引導輿論，構建擬態環境。早在1920年代李普曼提出虛擬環境（pseudo-environment），認為媒體通過對客觀環境有選擇的報道塑造了人的大腦中的畫面，人們根據頭腦中的畫面開展行動，而並非真實的客觀世界，導致觀念和行為出現偏差。196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在《形象》提出“假事件”（pseudo-event）的概念，指是經過設計而刻意製造出來的新聞。^⑦假事件真假參半，說它假，是因為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人為製造的；說它真，是因為它真實發生了，能夠被看見。羊副市長就利用媒體策劃了食肉動物攻擊其他動物的假事件，構建了食草動物認知的擬態環境，並導致動物城居民根據擬態環境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和行動。也正如凱瑞“傳播的儀式觀”所表明的，人類傳播現象背後隱藏著政治經濟文化的意圖。

動物城裡，媒體帶有傾向性的報道扭曲了“現實力場”，為公眾設定了議程，讓食肉動物真的成為了罪犯，這也是綿羊副市長想讓他們展現出來的樣子。影片中大量出現了電視新聞的鏡頭，渲染食肉動物的攻擊性，影射出圖像政治。當記者問“為什麼襲擊別人的都是食肉動物？”兔子

朱迪說：“我想，可能跟食肉動物的DNA有關……”發布會結束後，幾天內，如下新聞接連而至：“近日在本市，連續發生了很多起食肉動物襲擊食草動物的案件。”這是赤裸裸的新聞報道扭曲“現實力場”。當你關注某個新聞時，媒體有更加注意同類新聞的傾向，所以從供給側上就會增多，此外，讀者的注意力也會聚焦到同類新聞上，這就是輿情的“積累效應”和“聯想效應”。現實也會被新聞報道的傾向性所扭曲。在動物城裡，當媒體論斷“是食肉動物的DNA決定了他們有攻擊性”時，食肉動物的攻擊性被“誘導”和“鼓勵”了。在一個文明社會，本來一些“惡的衝動”是可以被自行消解的，但誘導式論斷，會把它們鼓勵出來。本來，14個食肉動物莫名地有了攻擊性，但因為通過媒體放大的“DNA決定論”，食肉動物整體被污名化了。這也印證了“破窗效應”和“霍桑效應”：破窗效應顯示，如果對單個的不良現象不聞不問，甚至鼓勵，就會導致不良現象的無限擴展；霍桑效應是指，一旦某個群體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別人觀察”，個人就會改變自身的表現而迎合觀察者的需求。

動物城裡的孤立、分裂和衝突證明電視媒體在維持刻板印象和偏見中的重要角色不可低估。這也反映了美國的媒介現實。據皮尤中心（Pew center）的調查，儘管在線新聞日益普及，迄今為止電視仍是傳播政治事務的最重要渠道，將近60%的美國人每天看電視新聞，大約是每天收看在線新聞的人群的三倍。此外，相比於瀏覽網上新聞，美國人花費三倍的時間來收看電視新聞。正如行業報告所指出的，電視在政治競選運動中的作用日益增加是有據可查的。政黨將競選開支轉移到電視廣告，增加了情感吸引的重要性，並增加了視覺符號的重要性。電視是可視化媒介的核心，電視是一個高度依賴迷人圖片的媒介，視覺形象無可避免。^⑩隨著越來越多的選民依靠電視獲得政治信息以及報紙和雜誌劣勢的凸顯，視覺符號的重要性急劇增加。儘管詞匯和文本具有基礎性作用，但電視已經將非語言符號恢復到在人類歷史上無文字時代的首要地位。今天的政治傳播建立在視覺形象基礎之上，圖像是第一位的，而詞匯和文本則位於第二位。^⑪美聯社的攝影師埃迪·亞當斯談及拍攝的越共俘虜被槍決的照片時，說到很抱歉讓越共俘虜在新聞照片中看起來像個英雄，而實際上越共刺客剛剛殺害了一個南越警察助理局長家庭中的一員，他總結出圖像的誤導性。^⑫這都是證明現代媒介在生產、維持和擴散偏見中扮演重要角色，需要引起關注和批判。

（二）溝通消弭偏見

媒介持續地維持和傳播刻板印象和偏見，那麼，又如何促進認同，構建想像的共同體，走向烏托邦呢？解鈴還須系鈴人，溝通成為影片解決或維持偏見的渠道。通過溝通和傳播，可以讓人類彼此之間交換信息，維持聯繫，克服偏見，促進認同，達成共識。溝通主要採取兩種方式，一是直接接觸，即人際交流，二是媒介傳播，即大眾傳播。直接接觸，即直接與外群體成員進行面對面。人格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主張通過接觸溝通減少群際偏見。這種接觸的前提條件是：雙方地位平等，有共同目標，為共同目標彼此合作，有權威、法律或習俗的支持。^⑬影片中的兔子朱迪自己作為偏見的受害者，卻也不無諷刺地陷入對食肉動物的偏見中，認為食肉動物的DNA中天然帶有攻擊與野蠻型，造成與狐狸尼克的关系出現裂痕，但是為了拯救所有食肉動物的共同目標下，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在遵守法律（比如不能私闖民宅、錄音證據）的前提下，打破族群差異（食肉和食草動物），開展合作，事後真誠平等地與溝通，最後達成了理想化的“種族和解”，重新回歸烏托邦的認同中。

在現代媒介化社會中，由於直接接觸會有更多的非語言傳播摻雜其中，易於受到群際焦慮等因素影響，近年以來，研究者越來越注重間接接觸，也就是以媒體為中介進行群際溝通。^⑭而且

隨著信息和傳播科技的發展，直接接觸極為有限，需要大量借助媒介的間接接觸，所以，要充分認識和發揮以媒體為工具的大眾傳播在抑制刻板印象與偏見中的作用，通過大眾傳播傳遞善意與和解，增進群際關係。媒介固然會維持偏見，也為通過持續的信息溝通和宣傳，消弭衝突，糾正偏見，促進認同，塑造整個社會的共識。

影片中正反烏托邦兩個主題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合二為一，真誠溝通是終極解決方案。影片既有頂層設計也有小微對話。從表面上看，電影的主題是如何通過真誠地努力，破除他人對自己的“固有印象”或“偏見”。影片的設計者明確表達出了民族團結的中心觀念，通過描述對主人公從偏見的受害者到無意識的加害者的變化過程，傳播和呼喚更多的真誠、包容和平等。在當下的美國，特別是難民危機以來種族之間關係趨於緊張的社會環境中，這部影片敢於涉足種族和宗教信仰等敏感問題，並引發觀眾的興趣和思考，顯得難能可貴。動物城像是一座包容不同文化、人種、宗教的世界級都會，在這樣一個構思精巧而規模宏大的烏托邦世界中，觀眾能輕易地看出動物們所代表的各色人等。影片告訴我們，“想要通過互相仇恨來報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的人，將會陷入痛苦之中；想要通過愛來驅散仇恨的人，將享受到愉悅和自信。他可以以一對一，也可以以一敵百，幾乎不需要命運的幫助，而那些被他征服的人也會心悅誠服”，“心靈的征服並不需要物力，而是通過偉大的靈魂”。^⑩

（三）娛樂救亡或是趨勢

在偏見橫行的媒介化社會，認同是否還有可能？在法律、政治、教育、傳媒等塑造認同的渠道紛紛失效時，娛樂救亡或將成為趨勢。在讀圖時代，碎片化、移動化、淺閱讀成為信息生產和傳播的趨勢，視覺和圖像在社會交往中的重要價值也逐漸顯現。正如胡塞爾曾斷言的那樣，視覺在直觀中具有把握事物本質的能力，在讀圖的時候，我們無需借助語言中介，通過眼和心就能夠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質。德里達和利奧塔等哲學家也認為，圖像崇拜將人的身體從語言文字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使人類從“詩意的棲居”轉向“圖像的棲居”，從“語言學轉向”走向“身體轉向”。^⑪而影片中的文化屬性就是所有族群所認同的娛樂精神領袖：夏奇羊。娛樂似乎成為偏見的黏合劑：我們都愛夏奇羊。影片中，陽剛硬漢形象的公牛隊長和娘炮的豹子都喜歡夏奇羊。在這個娛樂的語境中，消除了血緣、政治的不可調和的差異，娛樂文化屬性重構了人們對於動物城這個想像的共同體，血緣不同的“他們”變成了都愛夏奇羊的“我們”，實現了文化上的趨同。以夏奇羊為代表的大眾文化的興起，消解了文化的等級性與差異性，使得文化產品不僅在少數知識精英內部流通，而且在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的公共領域內流通。^⑫借助於娛樂，如電影中夏奇羊或《瘋狂動物城》這樣的電影來凝聚大眾和塑造共識，確實是屢試不爽的構建“認同”的措施。

但是娛樂之後呢？是否會帶來新的問題和困境？這讓人想起波茲曼的“娛樂至死”的預言：“在信息技術日益發達的時代，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⑬娛樂至死的本質是主體性的喪失。海德格爾將現代社會看作一個圖像時代，通過圖像來把握和理解世界，人與世界的關係轉化為表像者與被表像者之間的關係，即主體與客體的關係。這種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會遮蔽人存在的意義，進而導致對存在的遺忘，即“忘在”，這是整個主體性哲學的最大弊病。然而，縱使娛樂文化的屬性廣為詬病，但相比《動物莊園》的“專制至死”，娛樂至死成為相對最不壞的選擇。大多數人還是會願意選

擇《美麗新世界》中的“娛樂至死”。也許這也是影片中暗示的“娛樂救亡”的隱喻：在由大眾傳媒所開創的公共領域中，不同年齡、階層、文化、地域的人都能進行自由的溝通、交流、磋商，最終達成共識，和諧相處。^⑩

結語

《瘋狂動物城》自上映以來，在贏得票房的同時，也引起了廣泛的思考和評論。在電影文本的生產和傳播中，我們聯想到了普遍存在於社會之中的偏見，以及對抗偏見的彼此認同。在反烏托邦的隱喻中，我們看到了烏托邦的理想和期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電影本身作為一種媒介，是特定環境下的一種社會建構，^⑪體現了製作者的自嘲和娛樂精神，以及作者對美國社會存在問題的反思和批判。電影留給我的思考和探索的問題還有很多。作為一個文化產品，這部影片可能會被漸漸遺忘，但是社會中的偏見和認同的問題卻不能被忘卻，我們應該持續地思考和探索消弭偏見、重塑認同、尋找共識的路徑。常識必須被重複，否則它將被遺忘；邪惡必須被懲罰，否則它將繼續作惡；正義必須被褒揚，否則它將被埋葬。在與偏見作鬥爭的社會進程中，我們需要更多優秀而深刻的文化產品，能夠引起社會討論，促進公民覺醒，推動社會的文明進程。新的社會問題不斷湧現，在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媒介和文化產品任重道遠，我們希望看到更多更精彩的文化產品，能夠引發大家更多、更深刻的思考，為改造世界創造更多的可能。

①參見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01頁。

②③⑥⑬威爾·杜蘭特：《哲學的故事》，蔣劍峰、張程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8、141、29、147頁。

④李忠、石文典：《國內外民族偏見理論及研究現狀》，南寧：《廣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⑤托馬斯·莫爾：《烏托邦》，戴錙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1頁。

⑦參見陳奕、李昕燁：《本體論語境下的“媒介事件”之探析》，西安：《新聞知識》，2011年第8期。

⑧Robert Schmuhl, *Statecraft and Stagecraft: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n the Age of Personalit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0.p87.

⑨Dan Schiller, *The Visual Image and the Political Image: A Review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2012,12(2).

⑩邁克爾·羅斯金：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9頁。

⑪⑫⑰參見翟成蹊、李岩梅、李紓：《溝通與刻板印象的維持、變化和抑制》，北京：《心理科學進展》，2010年第18期。

⑭⑮張聘：《“娛樂至死”還是“娛樂救亡”——對波茲曼《娛樂至死》的批判性解讀》，成都：《當代文壇》，2013年第1期。

⑯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⑰陳世華：《信息政治經濟學批判》，南昌：《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作者簡介：陳世華，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劉晶，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南昌 330031

[責任編輯 桑海 李俏紅]